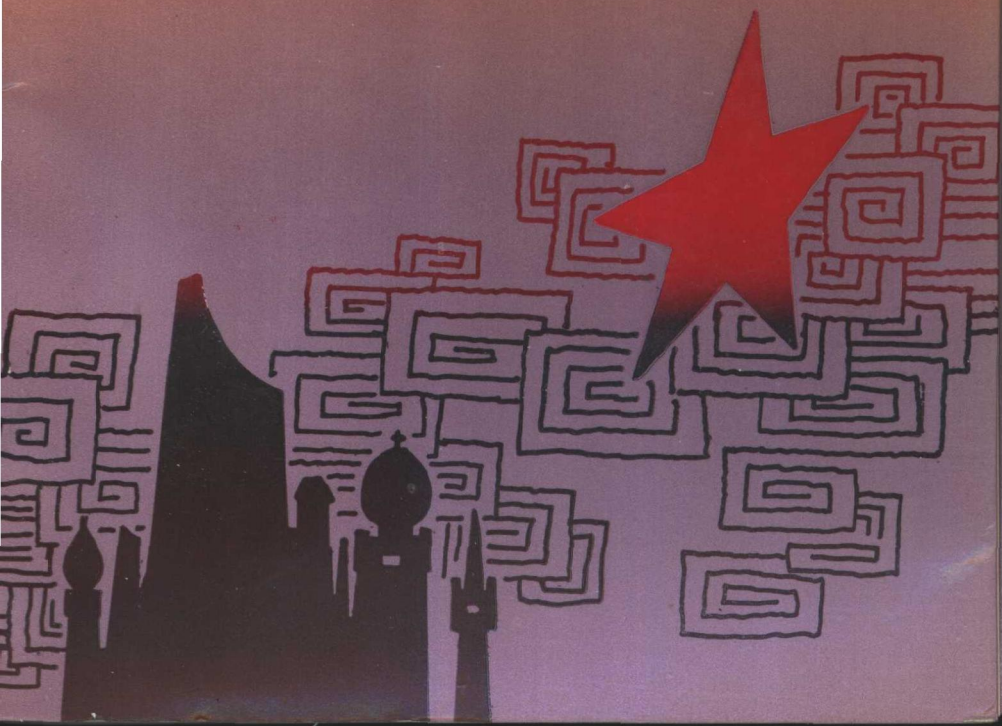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

● 叶卫平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
国家青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
最终成果

西方

「毛泽东学」

研究

●叶卫平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福州

(闽)新登字 01 号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

叶卫平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4 插页 321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11—01928—X
D·138 定价:7.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毛泽东学”的产生与发展	(1)
一、中国革命胜利和西方“毛泽东学”的产生	(1)
二、西方“毛泽东学”和西方“中国学”	(8)
三、西方“毛泽东学”的全盛期与各派争论	(16)
四、西方“毛泽东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价值	(36)
第二章 毛泽东与中西文化	(56)
一、地杰人灵说	(56)
二、中国佛家和儒学的“影响”	(63)
三、西方个人主义的“熏陶”	(83)
四、俄国民粹主义的“嫁接”	(90)
第三章 毛泽东与哲学	(117)
一、关于“两论”写作时间真伪的争论	(117)
二、《实践论》和“实践一元论”	(125)
三、对《矛盾论》的研究与批评	(137)
四、毛泽东的哲学地位	(148)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	(156)
一、毛泽东同马克思的“对立”	(156)
二、毛泽东和列宁的理论“异同”	(174)
第五章 毛泽东与党史若干事件	(193)
一、所谓的毛泽东亲国民党的时期	(193)

二、李立三和富田事件.....	(210)
三、毛泽东和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	(223)
四、王明和延安整风运动.....	(234)
第六章 毛泽东与斯大林.....	(247)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过.....	(248)
二、三次“左”倾路线和斯大林的责任.....	(270)
三、关于国共决战和朝鲜战争.....	(285)
四、高饶事件的真实原因.....	(304)
第七章 毛泽东与中美、中苏关系.....	(310)
一、所谓的毛泽东的亲美时期.....	(310)
二、1949年的“一面倒”.....	(321)
三、中苏分裂的原因和起点.....	(328)
四、中苏论战和国际风云变幻.....	(343)
五、中美关系的解冻同林彪事件的联系.....	(356)
第八章 西方“毛泽东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365)
一、比较研究方法.....	(366)
二、心理分析方法.....	(378)
三、版本考证方法.....	(396)
附录：本书所引用和参考的外国与中国著作书目.....	(415)
后记.....	(424)

第一章 西方“毛泽东学”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毛泽东学”是当代西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这一思潮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从西方“中国学”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的。它的左翼学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它的反共学派则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加歪曲和攻击；它的“自由主义学派”的研究内容比较繁杂，其中既有相对客观的论述和比较公正的评价，又存在着许多由这个学派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导致的错误结论甚至是歪曲之词。

一、中国革命胜利和西方“毛泽东学”的产生

1949年以前，西方“中国学”的阵容早已初具规模，可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学者却为数不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西方学者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穷党、非法的党、被围剿的党，加上国民党政权的新闻封锁和文化清剿，这个党及其领袖很难引起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重视。西方的左翼学者虽然同情这个党、支持这个党，但由于资料来源困难，也很难从学术上对它进行研究。在很

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有左翼记者才有“资格”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成为西方第一批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

西方最早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人，是一位美国女性公民，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妇女早在1921年就报名参加了美国公谊会服务队，千里迢迢地把救济品送往饱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害的苏俄；后来又毅然留在了苏俄，同一位苏联共产党员结了婚，共同创办和编辑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为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业绩引起了她的极大关注，于是先后在1925年、1927年、1937年至1938年、1940年4次访问中国，多次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此基础上，她出版了在国外影响很大的《1927年至1935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这本书。

西方最早研究毛泽东的左翼记者是一位美国男性公民，名叫埃德加·斯诺。他1933年至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教授期间，结识了同胞兼同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并与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了解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与国民党报刊宣传根本不同的真实情况。他曾经编译过一部英文版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的著作介绍到西方去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国采访和任教的7年中，深深感到关于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不但是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是许多西方国家人民迫切想知道的事情。由于红色中国“9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它的经历”，因此，“在世界各国中，恐

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①，从而促使这位年轻时就闯荡大洋、游历中美洲的水手，再次扬起黄土之舟的无畏征帆，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经过西安，来到陕北苏区。在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县，他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谈话，搜集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返回北平后，他为英美报刊写了一组关于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的通讯报道，顿时轰动了西方舆论界。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由伦敦的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的一个月內竟重印了5次，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该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的帮助下，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几个月內，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香港等地先后出版了许多种的《西行漫记》的重印书和翻印书。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者们不能不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在长达5个月的采访基础上，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书中评论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政治领袖，由于远大的目光和对于局势的正确估计，而成为共产党的杰出人物”。“这位中国的列宁获得了一个革命领袖特有的长期活动的经验，有了这种渊博的经验，他才能胜任目前的职位，这种渊博的经验不低于任何天赋的才能”^②。她不但比较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而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页。

②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337页。

且初步揭示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辩证性质，她风趣地写道：关于中国革命这个复杂命题的问答，是极端辩证的。应用到这样一个难题上去的方法是从对立中间发现统一，在这里“辩证法”的确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非常宽大的用语。我想像不出一个更加愉快的智者竞赛会，比如此刻聚集各时代所有著名的辩证大家在一只中国茶桌的四周，把这个命题提供自由讨论。“‘右’边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左’边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史达林^①在主席位上指导，年迈的安那其主义者老子在桌子下首的长凳上吃西瓜子”^②。这一分析从当时的认识条件来看，是独具慧眼的。《在红色中国内部》这本书 1939 年在纽约双日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后，当年 4 月就被复社译为中文，以《续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不久，在香港等地也多次被翻印。

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苏区搜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资料的西方左翼记者还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T. A. 比森，伊万斯·卡尔森等人。这些敢于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所留下的著作，至今仍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研究，同后来的西方“毛泽东学”是有较大的不同的：

第一，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比后来的西方“毛泽东学”要小得多，在他们那里，毛泽东研究尚未形成一门学科。

第二，由于他们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 年中译本作的序中写道的那样：这本书的故事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青年们所创造和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

① 史达林即斯大林当时的中国译名。

②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 383 页。

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①。

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从中国苏区获得的大量真实材料，虽然为西方舆论界所注目，但是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这些材料却不屑于一顾。迈克尔·谢勒说：“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不确定和敌视的混合物。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对亚洲农民产生号召力一事感到迷惑。虽然他们有时也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农业改造者’的党，但把所有的共产党运动都看成是处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所以是莫斯科的傀儡的，也同样是这批专家。”^②后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十分吃紧的时候，也曾一度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以借助于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牵制日本军队，但这一行动在蒋介石的阻挠和破坏下，很快就被美国决策层放弃了。

同样，西方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也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期，才开始重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虽然1945年美国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出版过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1946年英国伦敦的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出版过斯图尔特·格尔德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但影响都很小。直到1948年至1949年间，才有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著作出版，其中仅美国就出版了：1948年克莱尔和威廉姆·班德写的《同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的两年》，1949年杰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7页。

② 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132页。

克·贝尔登写的《中国震撼世界》，特别是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出版的《美国和中国》一书，初步涉及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1949年费正清又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哈佛大学中国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一书，表明了他要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的意图。1950年美国亚拉巴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本书可算作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毛泽东学”著作。只是由于罗伯特·佩恩的职称不高、名气不大，因此西方学术界才一般把费正清的学生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当作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本杰明·施瓦茨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195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C·马丁·韦慕庭也从原来专攻中国古代史转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编写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日文资料和中文资料各一本。1956年美国统治集团的智囊团兰德公司的顾问兴登写成了《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物》一书。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查尔斯·麦克莱恩的著作《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人（1931—1946）》。195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出版了《中国的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

上述著作遍及史料编纂、传记研究和思想研究3个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这些著作不像西方的反共宣传那样赤裸裸地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曲解乃至歪曲的同时也不乏有比较客观的看法和独

到的见解，有的还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例如，罗伯特·佩恩就在书中指出：“美国高层已经在中国问题上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而且现在仍然继续在犯错误，尽管他们被警告过，但他们仍然不懂得亚洲发生的革命变化”。当共产党的士兵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经常打着赤脚，但却带着最新式的美国武器。“如果没有缴获的美国装备，中国征服者可能至少要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胜利，或者根本不能胜利”^①。虽然他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被缴获的美国武器这一点是错误的，但他认为美国决策层不懂得亚洲发生的革命变化的真正根源是其对华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却是比较深刻的。他还告诫美国政府：“如果我们沉浸于关于中国的未来充满危险的想法之中，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里缩小由毛这位喜爱诗歌并具有中国古代皇帝那种不妥协性的人所奠定的政权的意义，那将是可悲的。”^②不久后，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证实了他的预言。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者的这些批评在中国革命辉煌胜利的礼花的映照下，使自己在美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眼中仿佛也具有了红颜色，引起了麦卡锡主义者^③的神经过敏，使他们感到了莫大恐慌，于是对这些批评者加以迫害，费正清受到传讯，拉铁摩尔被迫离开美国加入了英国籍，对此，迈克尔·谢勒写道：“由于麦卡锡的非难，以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拒绝对这一非难进行抵制，其结果是政府中整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在专业上被摧毁了。对这批正处在职业的生涯鼎盛时期的外交官的清洗，造成

①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第276—277页。

② 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第278页。

③ 麦卡锡主义者指以美国原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极右派。他们在1951年至1954年间一度操纵了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人士。

了这一结果：在下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出现之前，必然有一段长时间的空白。在这期间，就只能是盲人骑瞎马了。”^①

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批评并没有超出维护美国资产阶级对外利益的范围。今天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观点同华盛顿官方路线并无分歧。我们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西方“毛泽东学”研究者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批评，其目的也往往在于促使美国统治集团能够花大本钱“把中国变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二、西方“毛泽东学”和西方“中国学”

西方“毛泽东学”是在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发展的背景里从西方“中国学”中分离出来的，它形成后仍与后者保持着联系。

西方“中国学”的历史渊源可以回溯到16世纪的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从他开始，西方各国的耶稣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大多从事“中国学”研究。他们除了通过编纂字典和翻译儒家经典的方式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之外，也很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735年杜·阿尔德在法国出版了《对满清帝国的地理、历史、年代学、政治和物理等方面的评述》一书，1814年巴黎法兰西学院开设了第一个大学汉语讲座，1820年阿贝尔·雷米扎出版了第一部《汉语语法基础》。1732年意大利神甫马国贤在那波利创办了中国学院，后来成为20世纪意大利东方学院的前身。英国1876年至1877年间也分别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开设了汉语讲座。荷兰也在莱顿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学”研究机构。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

^① 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第184—185页。

国的大门，它们为了满足侵华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学”学科的迅速发展：

第一，美国的“中国学”是美国对中国实行殖民掠夺的伴生物。美国第一批“中国学”家几乎都是来华实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美国最早的“中国学”杂志《澳门月报》的创办人和主编裨治文，就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神甫，后来当了美国的外交官。另一个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继裨治文之后任《澳门月报》主编。他于1848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中央王国：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述》，被美国学术界视为标志着美国“中国学”开端的奠基作。1842年经裨治文、卫三畏、顾盛、伯驾等人策划，美国马萨诸塞州法院批准成立美国东方学会，这个学会是美国最早的“中国学”组织机构。1876年，卫三畏在美国耶鲁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并负责主持汉语研究工作。这些“中国学”家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研究，积极为美国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出谋划策。鸦片战争结束后，裨治文等人为美国专使顾盛出主意，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无能，胁迫它签订了《望厦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侵害中国主权的领事裁判权，得到了“最惠国待遇”，享有中国被迫给予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美国的另一个“中国学”家丁韪良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提出保留一个受洋人控制的朝廷比直接瓜分中国更有利于列强的建议，促进了八国列强迫使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实行间接的殖民统治，从此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而美国除分到赔款3290万两银子外，也像其他列强一样攫取了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驻军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趁欧洲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大力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相适应，美国研究中

国的机构迅速增加，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共建立了 39 个研究“中国学”的机构。其中著名于世的有：1927 年成立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它的部主任是曾在中国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恒慕义。1929 年该部从天津盗买了 2.2 万册中国图书文献，收购了顾盛 1879 年从广州弄来的 2500 本汉文、满文图书文献，又接受了美国外交官柔克义捐赠的 6000 册中文图书，从而初具规模。30 年代它又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大量购入中文图书文献，使中文藏书达到 13.5 万册。1928 年成立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和培养“中国学”学者方面也颇有名气。1956 年它虽然并入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但保留了原有的名称和职能，编辑了《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学索引丛刊》等出版物。

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学者中有许多人后来都从事“毛泽东学”的研究。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 C·马丁·韦慕庭原来专攻“中国学”，1943 年曾出版过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前汉时期中国的奴隶制》一书，1954 年后转而大量翻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资料。芝加哥大学中国语言和历史学教授顾立雅，1932 年至 1935 年、1939 年至 1940 年两次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的名义来中国留学，1949 年至 1962 年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他在“中国学”与“毛泽东学”两方面的研究兼而有之，先后出版了《中国诞生》、《孔子——其人及其神话》、《中国的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等论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从资金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学”的扶植。美国开设“中国学”课程的第一流大学由 7 所增加到 13 所，许多学校还举办了各种关于中国问题的讲习班。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的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现代研究的比重大大提高。梅里贝恩·卡麦隆在美国《远东研究》杂志上统计过，1942 年至 1945 年 5 月间美国出版的 50 部关于中国

问题的比较有名气的著作中,2/5 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到 50 年代,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刺激下,美国已经有 30 多所大学设立了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耶鲁大学东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

第二,英国的“中国学”虽然历史悠久,却不很发达。老一代的“中国学”者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韦利,剑桥大学的珀西里,《大亚细亚》杂志的出版者、希特勒统治德国后侨居英国的移民申德莱尔,在剑桥大学长期主持“中国学”研究工作的加拿大人普利布兰克,牛津大学的中国语文学家霍克斯、中国现代史学家赫德森等。直到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 1960 年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邀请美国籍教授麦克法夸尔为主编,1968 年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所,邀请美国籍学者施拉姆为所长后,英国的“中国学”才在“毛泽东学”的带动下发展起来。与此相比,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的“中国学”却要比英国发达得多,其中名列前茅的是香港友联研究所。该所 1951 年建立,拥有 50 多名工作人员,它不仅进行广泛的搜集资料和研究、出版工作,还向国际学术团体提供服务,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曾从它那里获得缩微胶卷的复制品多达 2500 盘。

第三,原联邦德国的“中国学”在 20 世纪初也已经产生,其创始人是 5 卷本《中国史》的作者奥托·福兰克和《元朝秘史》的作者艾·黑尼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托·福兰克的儿子付吾康创立了原联邦德国“中国学”的汉堡学派,这一学派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朝历史的研究;艾·黑尼希的接班人黑尔贝特·福兰克则创立了除研究中国历史外,还涉足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慕尼黑学派。黑尔贝特·福兰克曾担任主管原联邦德国学术团

体、学术研究项目拨款、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工作的原联邦德国研究协会副会长职务，多次负责制定各项“中国学”研究规划，主持在原联邦德国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会议。除了大学研究机构外，原联邦德国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学”研究所：1. 汉堡亚洲研究所。它集中了近10名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专家，其中包括了付吾康和黑尔贝特·福兰克的学生，出版了印数800余份的《现代中国》杂志，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尽管这个研究所的学者极力标榜自己对政府的独立性，但他们却经常向政府提供自己的研究材料特别是关于中国政策的分析报告。2. 科隆的联邦东方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它是在阿登纳的时期建立的，名义上直属原联邦德国内务部，其主要工作却是为外交部服务。3. 慕尼黑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写调查报告。它的“中国学”者格劳比茨专门研究中国与苏联、日本的关系，出版过《中国和苏联，联盟的成立与破裂》一书。在原联邦德国的“中国学”家日益重视中国现实问题的推动下，50年代付吾康也把注意力由明史转向现代史，195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8年出版了《中国革命一百年（1851—1949）》，1960年又出版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中国与西方国家》等论著。

第四，日本的“中国学”是在明治维新后，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扩张侵略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因此，除了研究古代中国的“中国学”之外，还有：极力贬低甚至侮辱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中国学”，其目的在于增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侵华信心；研究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国学”，其中有一部分人极力鼓吹由日本出兵帮助中国的革命党人推翻满清和军阀政府，而后由日本全面取代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霸权；欧洲式的“中国学”，即仿照欧洲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封建国家，没有经